

易杰雄◎著

哲学、文化与人生

ZHEXUE WENHUA YU RENSHENG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哲学、文化与人生

ZHIXUE WENHUA YU RENSHENG

易杰雄◎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文化与人生 / 易杰雄著.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545-1405-4

I. ①哲… II. ①易… III. ①文化理论-文集 IV.
①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5735号

书 名 哲学、文化与人生
作 者 易杰雄
责任编辑 郝建国 赵 磊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1405-4
定 价 39.80元

一个思想工作者的生活， 全在于他的思想（代序）

我之所以喜欢哲学，这还得从中学时代的老师说起。

高中二年级，记得教导主任杨思德教我们辩证唯物主义常识，他讲到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可能性与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这一系列对立统一规律时，感到当时帮了我很大的忙，从而感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用，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非学好哲学不可。这主要是有两条原因促成的：一是，中学时代是一个人世界观形成的时代。这时哪个教员、哪门课讲得好，往往决定一个学生将来学什么，从事什么职业。二是，当时我们班正好出了一件事，同学们迫切需要有人出来，特别是班干部出来给一个理论上的说明。我作为主要班干部，正好利用杨思德老师所讲的这些原理在班上作了分析，大家觉得听得很过瘾。就是这些坚定了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决心。

—

后来，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就拼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另外，由于我的俄语是在农村中学学的，学得也少，老师在课堂讲的口语，我一点儿也听不懂，不像大城市出身的同学。每次老师提问，我都一个大红脸。因此，当时我的主要精力

放在了这两门功课上。为了集中精力学好这些功课，我坚决辞掉了原来担任的团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我又认真读了唯真译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本），九评和李卜克内西与拉法格写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后来到了《承德日报》工作，又系统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和《列宁选集》（四卷本）。从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崇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时，《承德日报》的工作人员觉得自己有这些知识应付工作足够了，平时就把学习放松了。而我觉得有这么好的条件太不容易了，于是更加拼命学。晚上，别人都打牌、下棋、散步，而整个报社常常是我一个人的办公室灯亮着。

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当时有读完了大学的人，有我们这些没有读完大学的人，有工农兵新学员，还有自学成才的人。这些人有的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的是想学到更多的知识，现在得到了一次考试机会，报名的人很多。而我一下就考上了。

十多年很难集中读书，考取研究生之后能坐下来好好读书了，觉得太不容易了。于是我拼命学习专业 and 外语。三年后，我留校，从此，进入了教学和专业研究阶段。

二

过去我总有一种认识，认为我们的哲学研究因“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多年，比哲学研究队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最大的苏联，要落后得多。于是我把学俄文与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我知道，要读懂并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除了深刻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外，还必须学好俄文，如果研究苏联哲学，光靠看翻译的东西是不行的。

早在毕业前夕，我就参与了翻译苏联著名哲学家费·多·谢耶夫

主编的《唯物辩证法理论概要》，那时是1983年，中苏关系还没有正常化，翻译后还不能公开出版，还是内部出版的。通过对这本书的翻译我们深深认识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体系还是原理的表述上，已与苏联过去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我国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大不相同。这从他的每一章的标题上即可看出来：作为发展学说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自然界和社会的辩证法；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客体与主体的辩证法；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历史主义是辩证地认识并改造世界的原则；现代科学认识中系统性的问题与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原则。毕业后，我还继续参与翻译出版了列·尼·苏沃洛夫著的《唯物辩证法》、格·姆·达夫里扬著的《技术、文化、人》和苏联科学院哲学教研室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这是他们为具有一定哲学知识的人，具有副博士学位考试的人用的教材。《历史唯物主义概论》出版后曾作为我国教育部规定的研究生主要参考书。这些书的出版为提高大家的哲学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毕业后，教研室给我安排了上“列宁《哲学笔记》”课，“列宁《哲学笔记》”是哲学系最难讲的一门课。要不是有黄楠森先生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和张翼星先生讲授的列宁《哲学笔记》课，我是不可能完成讲《哲学笔记》任务的。

黄先生是我国哲学界最知名的人，是我考入北大时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人。他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给一切研究列宁哲学的人以极大的帮助。他思想深刻，知识面宽，对英文和俄文都有很好的把握，但对一些原则问题从不迁就。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讲课时就提出，我们向苏联学习，实际上是向斯大林学习，这里有错误的成分；无数有限之和仍是有限，永远也达不到无限，等等。当时我即认识到，要全面达到他的水平，像我这种人怎么也不可能。

张翼星先生一生坎坷，但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始终不改。他为人

率直，知识面很宽，既有马哲史又有西方哲学史的著作问世，还有现代史上一些人物的回忆，如他写的《难以消失的烟云》，写到最智慧的人受到不应有的政治迫害；他一生著作等身，至今仍笔耕不辍，是我最敬重的一个人。他的课讲得极好，我讲列宁《哲学笔记》的框架、思路全是他的。他研究非常细，如运动和变化的思想，应当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非书本上所注释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如，当讲黑格尔的矛盾展开思想时，他指出，这里讲的对立统一规律思想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讲的不是一回事，等等。后来我们出版《列宁〈哲学笔记〉研读》不仅运用了张翼星先生的讲课成果，还吸收了勃·姆·凯德洛夫的思想，如他对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解释和他关于辩证法要素的解释。此外，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真理的定义、“统一相对，斗争绝对”含义的探讨等。

1989年，当时中苏两党关系还没完全正常化。组织上决定派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苏联学习进修一年。出发前，我给自己定下了这样几个目标：一是在苏联使自己的俄语再提高一步。像我这样人，过去虽然学过外语，但十多年不用，想再捡起来时，年岁已偏大。后来通过努力，外语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看专业书还是离不开辞典。这是不行的，特别是靠它搞专业，吃专业饭。二是争取在专业上有一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唯物辩证法和列宁《哲学笔记》方面。三是交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建立一些学术联系，为日后进行学术交流打好基础。我认为这完全可以做到。因为我校刚请T. U. 奥伊则尔曼和列克托尔斯基来校讲学。奥伊则尔曼当过世界哲学学会的主席，苏联科学院院士，在我国翻译过来的书就有15种之多，还有大量著作没有翻译过来，是苏联具有最大影响的大学问家。他九十多岁后还是每年出版一本书。他知识面很宽，特别是对马列著作读得熟极了，而且记性又好，这是一般的人都无法相比的。另外，他头脑也活，我到莫

斯科后，请我第一次到他家吃饭，他戴着各种勋章站在门口，其他家庭成员依次列后，然后，请我入座。我拿出送他的礼物，两幅竹帘画，他们全家都十分满意。入座后，他对我介绍这是法国厨师做的拿破仑最喜欢吃的千层饼，那是……然后又介绍起了酒，记得他一下子拿出十七种酒，这都是那些国家的名酒，要我每一种都尝一尝。后来他很有感慨地说，很可惜，就是没有我国名酒茅台。他说，不能想象，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还不能买一瓶酒（当时一瓶茅台 300 多元）。2005 年我去莫斯科开会，到他家去拜访他时，他还把两幅竹编画挂在正厅中央。另外，他从北京回去以后，还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其中讲到中国一个副教授请吃饭，居然搞了 18 个菜。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哲学家之间的深厚友谊，两国学者之间的深厚友谊，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列克托尔斯基当时也是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哲学问题》主编、认识论研究所主任。后来我就由他领着见了他们所长，他们所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的全体同志，其中特别是格里戈里扬，苏联著名的人学专家，还有凯德洛夫的夫人。

到莫斯科大学后，我被分到曾在我国担任过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顾问的卡西切夫当指导老师。他给我们开两门课：一门是苏联改革，一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另一门，就是我们跟着听俄语课。在这种情况下，我比较集中精力地学习俄语和专业。

在俄罗斯学习外语主要是跟着老师学，二是结合专业学。结合专业学我主要看了凯德洛夫的书，《列宁〈哲学笔记〉的伟大实验室》《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三个伟大的设想》《辩证法的对话》等。《辩证法的对话》这本书较之我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更符合马克思所构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批评过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写的唯物辩证法的著作，说他因修养不够，本来只要两三个印张就足够了。根

据恩格斯的指示，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哲学也要改变自己的形态，不仅在文字上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在内容安排上还有发展的思想及其对科学的渗透、科学与哲学等许多新的东西。《列宁〈哲学笔记〉的伟大实验室》和《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三个伟大的设想》思想之深刻，观点之独到都是我们不可望其项背的。我的“评苏联哲学家对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的研究”就主要是肯定他的思想。而这篇文章在俄罗斯《哲学问题》上也发表了。我之所以如此敬仰凯德洛夫，由于在这之前我看过他的一本翻译过来的书——《论自然辩证法》，这是一本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具有统一的辩证法规律的书。把一本学术著作写得如此生动而又准确，实在不多见。他研究的领域与我一致，更重要的是他的高尚的人格力量。我到俄罗斯时，他已去世，他夫人告诉我，“文革”前他应邀到我国来讲学，一方面，对中国知识分子评价很高；另一方面，对中国人说的都是一种声音，他感到中国非出什么事情不可。对他这种哲学家的敏感和预见性，我感到由衷佩服。更叫人敬佩的是，他一直从事列宁《哲学笔记》研究，对斯大林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受黑格尔的影响，一直对《哲学笔记》评价不高，始终很有意见。斯大林死后，他立即发表了关于《哲学笔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峰的观点。从此始终以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最高权威活在苏联哲学家与世界哲学家的心中。说来惭愧，由于对他老人家的这一成果不了解，我还和其他两位同志把这个观点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安徽大学学报》上了。想起来就感到汗颜。虽然从未谋面，可他老人家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导师。我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以他为榜样。这些年来，无论哪一次去莫斯科，我都要到靠近赫鲁晓夫墓地的新圣女公墓他的墓上去献花，以寄托哀思。

一年的进修时间，收获是比较大的。首先通过跟老师学俄语，自己看书，外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最突出的表现是，看书比原来快

多了，专业词汇比过去有了很大的丰富。

在科学研究方面，我历来认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是革命的批判的，主要真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不正确，亦可引起争论，起到推动真理发展的作用。这一认识，后来通过系统读凯德洛夫的书，更坚定了自己的这种信念。我毕业后不久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问题”，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文摘报》作了报道，《新华文摘》作了摘登。我在考研究生时，我们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总觉得这个口号不完全周延，于是我通过长期、反复研究，指出这一提法存在的十一方面问题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法上的不一致，并在它发表十周年的时候在《求是》杂志的《内部文摘》上刊登了我关于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一致的地方的部分论述。此文的发表在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收到了大量读者的来信。后来随着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在公开杂志上包括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对这一提法的十一方面不周延的问题都全部发表了。此外我还提出了“统一相对，斗争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的质疑”“对抗与非对抗性矛盾不是一回事”等大量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后来都收集在我的哲学文集中。

另外，关于苏联和俄罗斯哲学研究，我还在《哲学译丛》《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上先后写了《凯德洛夫》《奥伊则尔曼》《列克托尔斯基》《施威列夫》等，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主要学术成就。

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早在苏联还存在时，在它的《共产党人》杂志“伟大的转折”一文中就提到黄楠森及其同行易杰雄等人在中国确立了研究列宁哲学的总体方向。我还在世界各国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近二十篇，有的还发表在世界著名的刊物（SSCT&AH），如美国的《科学与社会》vol, 73, no, 2, April, 2009, 175—190; A Marxist Perspective on Chinese Reforms: Interview with Jiexiong Yi; 俄罗斯的《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07, 5, И Цзэсюнь:

Является ли мыслью Ленина положение, что сознание творит мир?

正当我精力充沛全力投入我的科研与教学任务时，突然接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交给我的一项任务，担任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哲学分支学科的主编，负责主持修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除开会外，仅讨论词条就十多次。我们搞出的词条都得由总编黄楠森先生审定，为此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好在我的创新和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如凯德洛夫等词条都顺利通过了。

三

我觉得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创新，科学技术落后。一句话，缺乏理性。

西方哲学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除苏格拉底外，都是大科学家，都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可以以学术为乐趣，以求真为旨归，把人生的意义归结为求知，把求知当作人性的表现，人格高低的象征，把做知识分子看作最高尚的人生道路，把能否在知识的大海为人类作出最大的贡献看成人生的最大幸福。据说，柏拉图曾在他的学院写了这样的标语：“不懂几何学的人不得入内。”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完成完全归功于柏拉图学派。近代西方科学家就变化无穷的自然现象探求其不变的规律，揭示其数学结构，终于造成人类知识的不朽伟业，其最初的灵感都是受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的启发。古希腊的哲学家每于天文、数学、物理都有很高的造诣。亚里士多德集西方古代学术之大成，其生物学的研究差不多是西方实验科学之范型。他曾把数学、物理学这些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创制科学（诗学、修辞学、辩证法）作为科学的总称。近代西方哲学之创始者也绝大多数为科学家。如笛卡尔发明了解析几何，并于光学及解剖学俱有创获；斯宾诺莎为光学家；莱布尼茨首创微积分；洛克长于生物学、

医学；康德早年在大学讲授数学、物理学、自然地理与人类学等。西方哲学与科学同源，最早的问题为天地万物之根源，“一与多”“变与不变”遂成为思辨、争论之中心。希腊哲学家从普遍好奇心出发，目的是为求真。因此，希腊哲学特别富于探究与批评精神，故能“为知识而知识”，能不囿于传统，不囿于权威，推陈出新，抒己之见，“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为了找到一条真理，宁可不要王位”，遂成为不朽名言。所谓辩证法，就是对话的艺术。你说一通，我再讲一通，把你驳倒了，我就感到很愉快。

后来发展到培根，经验论要求科学与实验结合。这样西方就不仅有了科学，而且注意了它的应用。

而我们中国的文化创始人，皆为士人出身，家庭鲜有恒产。孔子少贱，庄周家贫，孟子的母亲尚需自己织布维持生活，家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学了比一般人多一些东西，但他们又不能像西方文化奠基人那样，完全不问生计而潜心于思辨探究。因此学有小成，就要考虑挣钱补贴家用，孝顺劳苦的父母，至少自主自立，不再增加双亲的经济负担。又不愿再走他们父母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不堪言的生活道路，怎么办呢？学好了，就去当官，实在当不上官，就做人家的幕僚、食客，学以干禄。因为在中国，从来都是有权者生活最好，不仅可光宗耀祖，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得到普通老百姓难以想象的好处。于是，“学而优则仕”就出来了。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有了严重的依附性，缺乏独立人格。他们说什么“三日无君，则皇皇如也”，或“弟子虽饥，不忘天下”。这里既有自利成分，又有一种人文关怀。

这就使中国哲学重世用而不重玄想。不仅重世用不重玄想，还不问真假。只要顶头上司听了高兴，就大加发挥；上司听了不高兴，就不说，也不问自己说的对上司有没有好处。重世用，达到“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地步。

这样，就使中国哲学抽象思维始终没有发展起来，而使“看人下

菜碟”的“感性直观”特别发达，从而导致中国科学特别不发达。拿现在的话说，创新特别少。

说中国对逻辑研究的人少，并不是就没有。真正对逻辑作过较多研究的就是先秦名家和后期墨家。先秦名家是中国历史上最先对知识、概念作逻辑研究的。惠施的“十大辩题”及公孙龙的《坚白论》《白马论》《指物论》等著作都是以纯粹的知识、概念为主，很少涉及政治、伦理内容。但这种纯粹以分析概念、范畴为主的名辩思潮，从其一产生就为中国传统思维所不容，遭到了来自儒、道两大派的尖锐批评。道家说它“弱于德，强于物……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①。连对中国式的形式逻辑的建立作出过贡献的荀子，由于受到的毕竟是儒家的教育，也批评名家是“弊于辞，而不知实”。这使以分析概念、范畴的名辩思潮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一个短暂时期，而影响极为有限。

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形式逻辑研究得最多、贡献最大的要数以《墨辩》为代表的后期墨家。他们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对时间、空间和运动等作了哲学概括。他们不仅注意到概念的准确性，也注意到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②的判断和推理原则。他们强调使用概念要反映客观实际，判断要正确，论证要充分。他们还把概念加以分类，提出“达、类、私”三种概念，为进一步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创造了条件。从思维方式上看，它完全不同于儒家和道家，抽象层度高，逻辑性强。但它同样也没有发展起来，特别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学经学的发展，后期墨家的学说很快被淹没，成了绝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比较重视概念逻辑分析推理规则研究的名辩思潮和后期墨家都未能进入中国文化的大

① 《庄子·天下》。

② 《墨子·小取》。

流，他们的学说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夭折了。

到了明清之交西学东渐第一波时，我们翻译了利玛窦等人带来的西方天文、历法和几何学。这时，明朝大臣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敏锐地认识到中西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不同，因此构成了西方科学所以多而中国所以少的原因。徐光启在给《几何原本》作序时说道，勾股，义弟亦能演示之，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使弟不仅知其然，而且使弟知其所以然。中国所以科学发明少，就是缺少“由数达理”的方法。

刚读研究生时，郭罗基给我们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其实，他讲的这些原理我们过去也学过，有的甚至还考过，不过，经他这么一讲，一层深似一层，我们都豁然开朗，佩服得五体投地。再后来，通过听朱德生先生的课，看他的文章和著作，特别是他发表在《哲学研究》1988年第2期上的“对一个熟知问题的再思考”一文，我深深感到，有些人学问很大，我们只要努力，是可以赶上的；但他们的思想，是我们永远也无法达到的。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自己真正的差距也正在这一点上。

正好在这一点上——我们民族迫切需要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我也迫切需要提高抽象思维能力，二者达到高度一致。

于是，我决定写思想界一些大思想家的传记。而大思想家的传记，对于一般人来说，比读他们的理论著作可能更有效。一是这类作品比较通俗，容易看懂；二是除了写作他们的理论成就外，还要写他们丰富的生活，这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三是这类作品往往结合实际比较紧，不乏作者对现实的看法。与此同时，也利于我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因为只有吃透原著的精神，才能更好地把他们写出来和更好地看懂作者写的东西是否忠实于原著，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一句话，才能深入浅出地把原著精神真实地讲给大家听。

在这种情况下，我主编了如下三部书：一是美国《世界名人辞

典》和英国《人民年鉴手册》（1985年版）列出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二是我们选编了《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三是英国 BBC 电视台通过网上投票选出的《千年世界十大思想家》。

《世界十大思想家》连续出了十多个版本，国家评了通俗读物一等奖，还被台湾书泉出版社买了版权出了单行本，被香港和《北京晚报》评为当年最畅销的书。在国内发了几篇受到赞扬的书评，在中国出版界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千年世界十大思想家》，是继《世界十大思想家》《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之后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对整个民族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承诺；另外，继 BBC 发布评选结果以后，好几家出版社可能因我前两套世界十大思想家出的效果不错，都给我打电话向我约稿，不好推托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千年世界十大思想家》中有爱因斯坦，通过他，可以大大提高我的抽象思维能力。尽管我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时就读过高等数学，并做了四千多道题。搞哲学之后，总觉得抽象思维能力不如我的老师郭罗基、朱德生，所以总想再好好研究一下爱因斯坦，特别是一开始只有几个人能读懂的相对论。

从前我就系统地读过范岱年等先生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接到这项任务后，又研读过。另外我还看了几本权威传记。此时，湖南科技出版社又开始出他的全集，我正好一本接一本本地看。就这样，我前后一共花了近四五年时间，才把它搞出来。由于对爱因斯坦把握得比较好，爱因斯坦逝世五十周年时，我发表了“一个把物理的直觉、政治的远见与哲学的思辨融于一身的创新巨匠”一文，对他作了全面评价。不仅写了他的相对论和科学上其他伟大发现，也写了他反对法西斯，反对原子弹，提倡建立世界政府的伟大贡献，还特别着重地写了他伟大哲学家的一面，着重辩驳了他有些说法虽然不科学但在哲学上独特的重大贡献。正如他自己反复强调的：为什么总在我的相对论上喋喋不休，我还做了更重要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己首先

是一个哲学家。由于我对爱因斯坦理解得比较正确，中央经济频道和广东电视台在做“相约莱茵河畔”节目时还邀请我作了关于爱因斯坦的介绍。《千年十大思想家》出版后，有的被评为国家通俗读物一等奖，有的并被被评为省、部级一等奖。

此外，我还应华夏出版社之邀，为他们组织编写了六卷本的《欧洲文明的历程》。这套书出版后，两本被评为省、部级优秀图书一等奖。还被专家推荐为研究生必读丛书。

四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们班出了一件事。选举海淀区人大代表，有一同学自己出来竞选。我当时很有看法。我想，自由选举这是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的反映，于是我给他贴了大字报。其实，从思想深处，还是认为自己正确。现在还不是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是搞了农村的村镇直选。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就应当允许人们去做。当时还不懂得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民主原则。本来就应该让人民自由选举信得过的人当人大代表和自己的领导，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任命。

1988年9月20日至10月20日，我们邀请了奥伊则尔曼和列克托尔斯基来我校讲学。他们讲得都很投入，大家听得也很专注。他们各自讲了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前沿问题。奥伊则尔曼还讲了新思维。他说，新思维是一种以全球问题为依据，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出点的新的理论思维。这一原则是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来的。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世界。面对核武器的威胁，人类是继续生存下去，还是灭亡？在这种情况下，罗素和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宣言，提出必须有一种新观念、新思维。他们提出消除各国间的敌对情绪，主张建立世界性的统一政府。他们虽然看到了人们都有防止核战争的一面，但忽略了每个国家十分珍视自己主权的一面。可

是另一方面，现在核战争，特别是核威胁依然存在，对国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生态问题，都不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不同社会制度的一切国家的相互合作。没有这样的合作，人类就可能灭亡。所以新思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我们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因为当时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分歧。《光明日报》对他作了长篇采访，《国外社会科学》约我写了“论新思维”，此文后来还在《国外社会科学》出版 100 期纪念活动时得了二等奖。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就是我到苏联进修。我事先和对方说好想去莫斯科大学，而事实上，被分到图拉一所大学。奥伊则尔曼回去后一问，跟教育部和莫斯科大学一讲，又与我未来的导师卡西切夫一讲，一切都办妥了。

到苏联去进修，对我触动很大。当时他们已提出“加速”战略很久，但始终不见收效。后来他们认识到，没有其他配套的改革，光是加速是不行的。于是他们提出了必须先进行政治改革以改变人们的观念。当时他们正在批判斯大林。在赫鲁晓夫时代就批判过斯大林，但他们认为那次批判不彻底。主要是没有什么都揭露，对涉及赫鲁晓夫等人的问题都被掩盖了，另外，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时又同时搞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这次对斯大林搞了过火的揭发。他们让当事人出来作现身说法，出了很多诸如《伟大的惨剧》一类的文章和书，仿佛斯大林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领导苏联人民战胜法西斯这些功绩全没有了，全是苏联人民的功劳。当时最突出的有苏共中央研究室副主任齐普科撰写的长篇文章《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他指出，只要是这样的社会制度，换了布哈林、托洛斯基也一样，同样出现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现象；他还说，斯大林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马克思指示办的。这是当时最尖端的理论。紧跟着是对新思维的宣传和论证。对戈尔巴乔夫国际、国内政策都解释成新